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当代社会

樊瑞平 王立胜 张文桂 主编

石油大学出版社

鲁新登字 10 号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当代社会

樊瑞平 王立胜 张文桂 主编

*

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 东营市)

新华书店经销

石油大学出版社照排室排版

山东省肥城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3.75 印张 36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636-0281-X/A₈·01

定价:9.60 元(平)

12.60 元(精)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10)
一、走历史必由之路	(10)
二、“一化三改”的总路线	(23)
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	(36)
第二章 充满矛盾的社会	(49)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49)
二、社会矛盾认识的变化和建设实践的失误	(58)
三、伟大的思想与历史的局限	(73)
第三章 存在阶级斗争的社会	(83)
一、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83)
二、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	(88)
三、阶级斗争实践与理论认识的相互影响	(99)
四、历史贡献与严重失误	(105)
第四章 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的社会	(117)
一、毛泽东一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	(117)
二、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特点	(124)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贡献与教训	(130)
第五章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41)
一、批判教条主义,开始摆脱苏联模式	(141)
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162)
三、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与规模认识上的变化	(183)
第六章 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	(197)
一、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97)
二、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	(203)

三、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	(210)
四、新时期对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思想的发展	(214)
第七章 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	(218)
一、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新发展	(218)
二、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	(225)
三、群众运动与党的领导	(235)
第八章 执政党的建设	(248)
一、执政地位带来的新变化	(248)
二、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是密切联系群众	(254)
三、党内团结的辩证法	(263)
四、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272)
第九章 反对和平演变的理论与措施	(285)
一、反对和平演变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285)
二、反对和平演变的理论与措施	(292)
三、反对和平演变斗争的新发展	(305)
第十章 改造哲学体系	(316)
一、要搞实际的哲学	(317)
二、哲学就是认识论	(329)
三、一元论的辩证法	(345)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模式	(360)
一、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	(361)
二、晚年毛泽东社会理想模式的形成及其构成	(370)
三、晚年毛泽东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形成的社会 历史基础和理论来源	(383)
第十二章 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396)
一、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及其新阶段	(396)
二、毛泽东思想与“特色论”	(411)
三、伟大的实践呼唤伟大的理论	(425)
后 记	(435)

绪 论

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不是自发的活动,它的发生发展一直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行的。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它的胜利与挫折,前进与倒退,都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息息相关。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以新的时代精神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无论是对于促进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健康发展,还是就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化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且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and 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的。

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只是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想目标,其概念还是比较抽象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从此社会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日益增多,但在中国什么时候搞及如何搞社会主义?那时,毛泽东还不十分明确。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曾设想要经过15年或20年的时间,等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再搞社会主义。随着国民经济恢复的顺利完成和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领导地位的确立,随着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互

助合作经验的积累，加之国际社会主义事业迅速发展所显示出的优越性日益显著，毛泽东对于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开始有了新的认识。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讲：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改变了先进行15年或20年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而采取了逐步过渡的方针，即实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

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不过，那时我国的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一穷二白的面貌并没有大的变化。毛泽东看到了并且非常重视这一问题，经过深入思考以后，他提出：在我国只是建立了社会主义，但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还要10年至15年。只有经过10年至15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才算建成了。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区别开来，这表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开辟了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到来，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进行艰辛的探索。

那么，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呢？1956年，毛泽东曾为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欢欣鼓舞。他要充分利用这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向自然界开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实现他多年的夙愿。那时他已发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弊端，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以苏联为戒，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毛泽东那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与探索适合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是同一个实践过程。

波匈事件和国内的反右派斗争，虽然使毛泽东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但是，非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战略没变，而且毛泽东深受整风反右中激发起来的广大群众的高度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所鼓舞，他认为，在当时的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当而且能够搞得更快、更好。于是，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和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大试验。从毛泽东的主观愿望说，是想尽最大的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使我国尽早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以争取更多的主动。应当承认，这种主观愿望是好的，而且只要党能正确地对人民群众高度的生产积极性加以引导，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符合于实际的主观能动性，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能够搞得快一些的。但是，由于急于求成的主观主义思想不断膨胀，严重地脱离了当时我国的经济技术条件，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最终却造成了与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使“大跃进”运动遭到失败。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利，使毛泽东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地思考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提出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许多符合社会主义经济法则要求的思想。为提高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他还认真阅读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述，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读书中，他曾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当时被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表达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惜的是，由于毛泽东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做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他没有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思考下去。在1962年9月召开的

八届十中全会上，他重提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并说这个时期可能是一百年或几百年。这就是所谓“大过渡”的思想。既然阶级斗争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自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当时抓阶级斗争主要是为了反修防变，故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表明毛泽东要重建他所缔造的党，要保卫和改造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毛泽东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就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他在给林彪的一封信（即后来称为“五七”指示）中，勾画了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五七”指示表明，毛泽东要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平等公平的社会；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人人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这是他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发展。所不同的是，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着眼于当时生产发展的要求，“五七”指示则主要着眼于反修防变的需要。不过，这种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蓝图，在当今时代的中国只能是一种幻想，或者叫空想。

二

纵观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在2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变化，可发现有两个不同的趋向：一是较为符合客观实际情况、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变化，如由先进行15年或20

年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转变为采取逐步过渡的方针;由实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转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自1958年底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为纠“左”提出来的,要严格划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尊重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等思想,这些变化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二是不太符合客观实际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变化,如在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1958年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以致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些变化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走了很大的弯路。毛泽东社会主义观念的变化,发生于主客观和国内外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条件下,往往是由客观形势特别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引起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思想认识的变化又引起战略决策的转变。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毛泽东有两次大的战略转变: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由以革命为中心转向以建设为中心,由与人斗转向对自然界开战;1962年后又由经济建设技术革命为中心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由向自然界开战转向与人斗。这两次大的战略转变,都直接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相联系。主要矛盾规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确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和战略决策的依据。应当承认,毛泽东是很善于分析矛盾并能够抓住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上的主要矛盾的。但可惜的是,1957年后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了失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以后,他仍然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思想经过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在1962年以后逐渐演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大过渡”理论。这个理论不仅导

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而且部分地改变了毛泽东1957年前所形成的社会主义观念。建国以来，毛泽东总是以对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利益的忠诚来振兴中华，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1956年，他开始摆脱苏联模式，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事求是地说，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提出了不少富有远见卓识发人深醒的见解。他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但几经周折，最后却形成了一个脱离国情、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这种脱离国情带有某些空想成分的社会主义构想，就其社会历史背景说，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外形势和人民群众愿望的一种片面的反映。其思想理论来源，有对马恩列斯有关论述的教条理解，有对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某些战时共产主义做法的经验照搬，也有对我国历史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的吸取和为适应形势要求的发挥。历史经验表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系列“左”倾理论观点和某些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是脱离实际，抑制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积极性，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就是说，他没有找到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三

毛泽东多年艰辛探索没有找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他逝世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找到了，并创立了较为系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自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出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

展的途径来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正像历史已经向人们表明的那样，斯大林没有完成这个任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是自觉地、积极地迎接这一新的历史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切实地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适应时代精神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冲破了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逐步确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第一次解决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继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现实的两次飞跃之后，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这次飞跃的实质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运行机制问题，找到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方法和途径，具体地解决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飞跃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是一种质变或部分质变，是通过旧质要素的灭亡和新质要素的产生实现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这三次飞跃，虽然对旧观念、旧原理否定的程度和方式不同，但都是通过突破旧观念，形成新理论完成的。当然，正如新事物是在旧事物的内部孕育、形成的一样，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发展，也不是完全抛弃旧理论，而是吸收有用的因素，增添新的内容，形成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理论。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虽然有着不同的内容，但在根本原则和方法上有一致性。马克思说，我们社会主义运动的使命，并不在于追求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而是解决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矛盾。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恩格斯曾这样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作经常变化

和改革的社会。马恩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仍有指导意义。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的创立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是第三次飞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结合的过程中,是继毛泽东找到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飞跃之后的第二次飞跃。第一次飞跃为第二次飞跃准备了前提条件,第二次飞跃是第一次飞跃的必然要求和进一步发展。两次飞跃虽然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但两者不仅有着历史的联系,而且实现飞跃的原则和方法是一致的,即都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坚持从国情出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邓小平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建设实际出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原则和核心内容。可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属于同一科学理论体系。

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更能较清楚地看出它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特色论”虽然形成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是自1956年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开始了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在探索中走了弯路,出现了失误,没有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但是,他们的探索为以后找到这条道路打下了基础,为“特色论”的创立准备了条件。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分阶段的思想,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

治局面”的要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等等，都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吸收。即使探索中的失误，也为“特色论”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邓小平同美国记者华莱士谈话，就说到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还能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那么，毛泽东探索中的一些失误，更是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国情的建设道路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为“特色论”的创立打下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它的创立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但是，毛泽东思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并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并需要伟大理论的指导。在我国人民正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加速现代化建设和深化改革的今天，为了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阔步前进，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践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撰写这本书，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并以此来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

第一章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旗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进行,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客观必然性,是全面探讨毛泽东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关系的首要一环。

一、走历史必由之路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首先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革命,然后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这是走历史必由之路。“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① 中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的完整发展阶段,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中国的必然表现。它既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又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已为事实所证明。

1.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表现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基于生产力运动的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决定上层建筑。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3页。

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于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便取代了旧的社会形态而出现了。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它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由此决定了人类社会形态也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前进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的连续性、继承性,规定着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规律性。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而也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但由于各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生产力又具有大体相同的连续性、继承性,所以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有着大体相同的“一般规律”。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中,第一次描述了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历史情况:“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并且同时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全面而深刻地论证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则明确地将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划分为五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发展的低级阶段)。以上便是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特点,直接考察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对人类社会形态进行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划分,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进行的系统阐述。

然而,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社会形态演变的规律性,在受大体相同的生产力连续性、继承性根本制约的同时,又受到各个民族或国家的自然条件、人口素质、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或消极作用、社会公众意识、外部暴力征服或国际援助等具体条件的影响。因此,每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在这些具体条件的影响或作用下,虽然在总体上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在各自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又会出现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即每一社

会形态在具体的国家和民族所持续时间的长短、表现的典型与否大不相同,也并非所有的国家或民族都要依次递进地经过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就是说,有些民族、国家和地区,借助某种特殊条件,可以跨越历史发展的一个或几个阶段,直接进入另一高级阶段,表现出历史发展的跳跃性。例如,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美洲印第安人,从16世纪开始,在殖民主义者征服、同化和先进经济生活的推动下,越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德意志、法兰西的氏族公社和多瑙河流域的保加利亚,在特定条件下由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东欧的一些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在本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等。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这种跨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现象极为重视,他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但不违背整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反而恰恰是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实现的基础和前提。世界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完全按“五形态”规律演进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只是少数,而大多数不是如此。因此,当某一国家和民族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具有了跨越某个阶段的可能性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就应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通过积极的努力,去促进这种超越。在19世纪8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还很不充分,广大农村还存在着原始土地公有制残余的情况下,马克思便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①恩格斯发展了这个思想,他指出:“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②“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③列宁更直接肯定俄国和东方国家不能局限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503页。

走“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① 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以此为前提。”^② 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只要组织了党的组织，组织了农民苏维埃，共产党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③ 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指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④

以上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普遍性和特殊性、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一方面，整个人类历史必然要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某个国家或民族在特殊情况下跨越某个阶段的可能。中国社会发展跨越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特殊表现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2.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中国社会的发展选择了社会主义，不仅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原理，而且也是中国社会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掠夺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许多志士仁人不懈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广大群众进行过无数次不屈不挠的斗争，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历时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以后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反侵略、抗剥削的巨大力量和英勇精神，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

①②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104、33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5页。